

和合与政治文明

张立文

〈中国人民大学〉

和合，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。无论是三代社会的禅让制的王道之治，还是《礼运》篇“大同”的理想世界，以至孙中山“天下为公”的理想，都没有放弃建构和合社会的追求，但由于各种内因外缘的限制，都没有实现。

和合从政治层面而言，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它关系着方方面面。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视察：纵向的历史纬度，以历史的资源为资治之鉴，可以知利弊得失、兴衰存亡之道；横向的现实纬度，以人与自然、社会、人际、心灵、文明的对话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道德、宗教的互动，可获协调、平衡、公平、公正地和谐实施；合向的融突和合纬度，从历史和现实纬度的发展，以明化解未乘融突的方案和趋势。本文试图从政治历史纬度来阐明这个问题。

一、和合与五教

和合是以实现和平、发展、合作的和合社会为标的。和合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民族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。人是天地自然的消费者，人为了生存，必然对天地自然构成破坏和损害，垦原田、伐山林，土地沙漠化，环境污染，生态危机，生存条件恶化；贫富不均，图财害命，假冒伪劣，社会存在不安定因素，直接动摇和合社会的政治基础；人际关系紧张，道德沦丧，拜金主义，见利忘义，人际之间无爱而有斗。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和合社会的建构。

《国语·郑语》记载：西周末年，幽王纵情逸乐，宠幸褒姒，危机迭起。郑桓公为幽王司徒，他与史伯纵论如何“成天地之大功”，使社会和谐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及如何协调人与天地、社会的冲突，使

和合社会的建构得以实现。史伯说：“虞幕能听协风，以成物乐生者也。夏禹能单平水土，以品处庶类者也，商契能和合五教，以保于百姓者也。周弃能播殖百谷蔬，以衣食民人者也。”其意是说，虞幕能“听知和风，因时顺气，以成育万物，使之乐生者也”（韦昭注）；夏禹治水，熟悉水性，因地疏导，“使万物高下，各得其所”（韦昭注）；商契能了解民情，因伦施教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百姓和睦，皆得保养；周弃能够播种百谷，培育蔬菜，让人民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。虞幕、夏禹、商契、周弃如何协调各方面关系？使社会和谐：一是要熟悉、体认天地自然和社会冲突矛盾所在，依据对象的本性，加以协调，如“知和风”、“知水性”、“察民情”，而达和谐；二是要顺其自然，尊重天地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则，如因时顺气，因地疏导，因伦施教，以使天人通、人地通、人伦通，通达而不阻塞，通达而和谐；三是万物高下，高下而有差分，差分而各得其所，各安其位。万物各行各业并育而不相害，和乐繁荣生长；四是增强人类的生产能力，播种百谷，培育蔬菜，丰衣足食，人人富裕，既不会贫富差距而动乱，也减少人对天地自然的掠夺；五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，文明程度，百姓和睦，皆得保养，以建构和合社会。这五个方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需要，由此可知，建构和合社会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，而是天、地、人关系的融突和合。

二、去和与取同

和合必须遵循多元融突和合的游戏规则，否则

社会就会发生危机。郑桓公和史伯探讨了必衰亡的原因，就在于“去和而取同”。《国语·郑语》记载：“公曰：‘周其弊乎？’对曰：‘殆于必弊者也。《泰誓》曰：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今王弃高明昭显，而好谗慝暗昧，恶角犀丰盈，而近顽童穷固，去和而取同。’”指出周幽王排斥明德之臣和顺明之相，而喜欢亲近阴险的佞臣和愚顽的小人。明德贤明之臣，能以国家社稷为重，忠言直谏，对君王的错误能提出批评；佞臣小人以个人利害为重，对君王阿谀奉承，助纣为虐。这便是“去和而取同”，社会必然弊败。史伯举例说：“夫虢石父，谗谄巧从之人也，而立以为卿士，与剽同也。弃聘后而立内妾，好穷固也。侏儒戚施，实御在侧，近顽童也。周法不昭，而妇言是行，用谗慝也。不建立卿士，而妖试幸措，行暗昧也。是物不可以久。”弃贤臣，亲小人，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，把不同意见者打成叛徒、反革命，这是剽同；弃申后而宠褒姒等女人，这是穷固；用侏儒、戚施，逗笑取乐，这是近顽童；不行法制，听女人褒姒和佞臣、小人的话治理国家，这是用谗慝；不用有德行的忠诚、贤明卿士，而让奸佞弄权，这是暗昧。这样国家怎能安定、和谐，不乱、不败、不亡是不可能的。这就是说，建立和合社会，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，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必须亲贤臣而远小人，不搞剽同；不内宠鄙陋识浅的人，不亲近愚顽昏昧的人；要依法行政，不任用谗言、邪恶的人，不让妖孽奸佞的人行权。这便是孔子所说的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。君子行和而不搞剽同，小人党同伐异，而不搞和。

所谓明德之臣和贤明之相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，就是“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以去其否，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无争心。故《诗》曰：‘亦有和羹，既戒既平。嘏无言，时靡有争。’先王之济五味，和五声也，以平其心，成其政也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）。这是齐景公与晏婴讨论“和”与“同”时的对话。君臣作为对待关系，不能以君认为行的，臣也认为行；君认为不行的，臣也认为不行，这是没有不同意见的剽同。政治和谐应该是君认为行（可）的而

其中有不行（否）的，臣指出它的不行（否）的而使其行（可）的更加完善；君认为不行（否）的而其中有行（可）的，臣指出它行（可）的方面而去掉它不行（否）的，这样政事平和，人心安定，社会和谐。这是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、侧面提出不同的、冲突意见，而后加以融合，而形成一个完善的方案，以便于实施，这便是和，换言之，这即政治文明，而与剽同政治相区别。多样、多元意见的融突和合，才能成其建构和合社会之政。

三、和生与剽同

和合，必须承诺差分，差分可能产生矛盾冲突，矛盾冲突而后协调和谐，而达和合。《周易·乾·彖传》说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顺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”天道变化，社会与时偕行，原有的政治、经济关系和人的等级地位都发生变革而有冲突，便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，即各正其位，各得其所，这样才能“保合太和”。“太和”即大和，大和而使万物茁壮成长，万国安宁。

为什么要搞“和”而不能搞“同”？史伯论与同时说：“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，若以同禅同，尽乃弃矣。故先王以土与金、木、水、火杂以成百物。是以和五味以调口，刚四支以卫体，和六律以聪耳，正七体以役心，平八索以成人，建九纪以立纯德，合十数以训百体……周训而能用之，和乐如一，夫如是，和之至也。”（《国语·郑语》）阴阳犹如他与他，承认“他者”的存在，他与他是平等的互动者，相异而融合、和合，“和”就是阴阳和而万物生。“和”怎能生万物？就是以土与金、木、水、火杂以成百物。“杂”韦昭注：“合也”。土等五种不同的事物杂合而成万物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说：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，男女媾精，万物化生。”天地男女即是阴阳、乾坤，是性质不同的、互相冲突的事物；“絪縕”、“媾精”即是融合、杂合；然后万物化醇、化生，即新事物、新生儿的产生。这便是冲突（五行、天地、男女、阴阳）→融合（絪縕、媾精、杂合）→

和合成新事物、新生儿（万物化生）的模式。

从理论思维的形而上层面来说，和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多元相异差分冲突而又和谐融合而成新事物、新方案，而不搞剽同。剽同即是指唯一的、相同的、绝对的东西，是不能化生新事物的。《周易·革·彖传》曰：“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。”水火灭息，二女同居，即是同，犹以水济水，水的性质没有变，二女同居，不能生育新生儿。西方本体论哲学都是以唯一的水、火、原子、绝对精神或上帝作为万物创造的根据，这犹如以“二女同居”的剽同作为化生万物的根源。

然而，史伯明确指出：“同则不继”，同不能化生新事物或新生儿，事物、人类就不能延续下去。因此，“以同禅同，尽乃弃矣”。晏婴也指出：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）以水济水，只有一种味道，而不是“和五味以调口”，琴瑟只有一种声音，而不是“和六律以聪耳”，就不成其美味、美声。所以，他们都反对剽同的一。“声一无听，色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。王将弃是类也，而与剽同”（《国语·郑语》）。只有一种声音就变成噪音，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，只有一种味道就很难吃了，只有一种东西就变成很单调了。弃和而剽同，就是单边化政治，霸权化政治，它只会制造动乱，制造弊败，制造战争，而不能使社会协调、和谐，繁荣发展。

四、和爱与离散

和合，既要制定从和出发的国家典章制度，又要建立处理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社会关系的和合原理、原则。孔子以“仁者，爱人”为指导思想的原则。孔子弟子有子提出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仁是体是内涵，礼是用是表现。国家礼仪制度的效用，圣明君王的治国处事，均以和为最高价值标准。无论是小事，还是大事，都做到恰到好处，即达到和

谐的状态，社会也会趋向和谐。

墨子从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思想出发，认为和合是治理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社会关系的原理、原则。墨子说：“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，离散不能相和合，天下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，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，腐●余财不以相分，隐匿良道不以相教，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。”（《墨子·尚同上》）家庭内父子兄弟互相怨恨，互相交恶使坏，家庭就会离散败落，由此推及天下百姓，亦彼此水火不容，势不两立，互以毒药相亏害（按，“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”指出以水攻火攻和毒药亏害。《墨子·天志下》）是以天下之庶國、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”、《墨子·明鬼下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、以兵刃毒藥水火。盖“亦彼此水火不容，势不两立”不适应。在汉文上注训点把意思和句中词的排列次序连起来为注训点，不能注训点。请指示），你死我活地斗争，国家就会离散动乱灭亡。人与人、国家、社会之间有余力、余财、良道，而不能相劳、相分、相教，天下陷于乱争而与禽兽一样了。

和合使家庭、社会、群体凝聚在一起，形成不离散的社会和谐的整体结构，这就是说，和合是社会和谐、安定的调节剂。“昔越王勾践，好士之勇，教驯其臣，和合之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。群臣、将士之间都能和合，便能团结一致，国家就会富强，社会就能和谐协调。

和合也是家庭、国家、社会不分裂的聚合剂：“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，皆有离散之心，不能相和合，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，隐匿良道不以相教，腐●余财不以相分，天下之乱也，至若禽兽然”（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）。父子兄弟成为怨仇，骨肉离散，社会动乱。墨子认为，治理国家，社会和谐，必须得知乱之所自起，不和合的原因在哪里？墨子一言以蔽之，是起自“不相爱”，譬如子自爱不爱父，弟自爱不爱兄，臣自爱不爱君，故亏父、亏兄、亏君而自利，社会便不能和谐而动乱；反之，父、兄、君自爱，而不爱子、弟、臣，亦是亏人而自利，也是社会不和谐、动乱的原因所在。所以墨子主张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。“若使天下兼相爱，国与国不相攻，家与

家不相乱，盗贼无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则天下治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）。这就是说“兼相爱”，天下就和谐而治，“交相恶”，天下就动乱而战乱。当前一些国与国、人与人之间交相恶，以怨抱怨，以暴易暴，结果战争、动乱不止。

墨子认为，“夫爱人者，人亦从而爱之。利人者，人亦从而利之。恶人者，人亦从而恶之。害人者，人亦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焉。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换言之，你对别人怎样，别人也会对你怎样。从古至今，概莫能外。因此，墨子提出：“欲天下之治，而恶其乱，当兼相爱，交相利。此圣王之法，天下之治道也，不可不务为也。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这是导致社会和合的根本原理，墨子的思想有其现代价值和意义。

五、和德与伤害

和合，必须加强百姓民众的素质教育，提升民众的道德修养，文明礼仪的水平。管子说：“畜之以道，养之以德。畜之以道，则民和；养之以德，则民合。和合故能习，习故能偕，偕习以悉，莫之能伤也。”（《管子·幼官》）在《管子·兵法》中有一段相似的记载：“畜之以道，则民和；养之以德，则民合。和合故能偕，偕故能辑，偕辑以悉，莫之

能伤。”畜养道德，人民就和合，和合就能和谐。道始于无端，德终于无穷，所以道不可量，德不可数。道与德对言，道既是世界万物存有的形而上的根据，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根本的价值原理、原则，以及人的精神的一种境界；德既是指天地万物的本性、属性，也是指人的本性、品德。道可以异在于主体身心的外在的价值原理、原则，德是内在于主体身心的道德修养、品格，它得于道或得于心。道畜民和，德养民合，人民有了道德畜养，便和合；和合所以和谐，和谐所以团聚；和谐团聚，就不会互相伤害；不互相伤害，便不会动乱、战争，社会就会和谐安定。就此而言，道德畜养，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。因为每个人有高尚的道德情操，不仅具有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恕道和爱人之心，而是在行为上体现为礼让文明，这是建构和合社会所需要的。

和合，在中国古典文本中既有系统的理论论述，又有实施的种种措施；既有像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这样“成天地之大功”的治国处事经验的对话叙事，又有像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《资治通鉴》的记叙。体认中华古代人的价值理想（包括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），领悟中华和合之道的精神，借鉴历史上和合社会的经验教训，于现代是有价值和意义的。